

《经济与管理》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共同富裕视角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政策效应研究
作者：付琼，张时政，李新光
收稿日期：2025-11-26
网络首发日期：2026-01-15
引用格式：付琼，张时政，李新光. 共同富裕视角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政策效应研究[J/OL]. 经济与管理.
<https://link.cnki.net/urlid/13.1032.F.20260115.1514.004>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共同富裕视角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政策效应研究

付琼¹, 张时政², 李新光²

(1.吉林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2.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19年12月，国家批准设立城乡融合发展改革试验区。本文基于全国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选取2013—2023年相关省份的811个区县进行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共同富裕视角下试验区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显著，但不同试验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与试验区内部的初始资源禀赋、要素配置效率及区域产业结构不同有关；另外，试验区的设立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有效促进共同富裕。为持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优化县域要素配置机制，加快试验区成果转化；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实施差异化城乡融合策略；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激发共同富裕发展动能。

关键词：城乡融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共同富裕；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既是经济总量的绝对增长，也是城乡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更是聚焦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0.943万元增至2.312万元，年均增速8.5%；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依然有所扩大，从2013年的1.704

收稿时间：2025-1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5BJL008）：《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长期投资驱动机制与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付琼（1973—），女，吉林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张时政（1999—），男，吉林四平人，吉林财经大学吉林经济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李新光（1985—），男，山东菏泽人，吉林财经大学吉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业保险。

万元扩大至 2024 年的 3.107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 2.81 缩减为 2.34^①，仍远高于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平均 1.5 倍以下），城乡间的不平衡仍然是当前主要矛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根本途径^[1]。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②，明确提出要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城乡融合的破题关键与推进路径，是亟待解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③。2019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8 个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④，提出设立 11 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试验区以“片区统筹”的发展思路，聚焦于以县域为空间载体推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发展及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其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先行先试探索价值。县域是城乡要素交换的中转站，推进县域城乡融合有助于打通城乡要素流动梗阻，畅通城乡互动，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近年来，国家对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2024、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相继提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我国县域空间广阔、人口众多、经济水平差异巨大，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短板也是突破口。当前县域内投资和消费水平较低，多数县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市场体系建设滞后，要素流动存在诸多堵点卡点，发展潜力亟待释放^[2]。

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基本单元，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支撑^[3]，立足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和实践路径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围绕县域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内在逻辑、政策演化、水平测度及具体实践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4,5]，从理论角度提出了其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等^[6,7]。但已有研究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政策效果关注并不充分：一是关于试验区的直接研究多数集中于单独经验模式或特定领域政策效应分析，缺乏深入县域的实践路径检验及全国层面城乡融合试点政策的定量评价，未能全方位、多维度验证试验区的改革效果和核心短板，导致相关政策建议缺少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二是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缺乏充分探讨，作为基础的城乡收入分配机制目前研究鲜有涉及，使试验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目标的实现路径不够清晰；三是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在不同资源禀赋区域的异质性表现分析不够深入，缺少跨区域对比分析，使得试验区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缺乏针对性。因此，本文基于全国范围内 11 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选取 2013—2023 年相关省份的 811 个区县数据，通过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衡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量化评价政策实施效果，明确政策实施传导机制及区域适配性差异，揭示县域城

乡融合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方案提供科学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试验区设立推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效果

重构中国城乡的空间格局和治理体系，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障碍，整合城乡发展空间，一体化统筹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2019年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创新性提出以片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思路，形成了“以县域为载体”“突破行政边界”“集群式发展”等特点，为推动城乡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8]。从空间维度，县域作为“城尾乡头”联结点，兼有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属性，可作为城乡空间格局的连接载体，突破城乡分割的发展格局，重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县域包含城、镇、村多元空间层级，城乡结构互补性与兼容性并存，拥有城乡要素资源整合的区位优势。从治理维度，县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城乡二元分割向一体化治理转型的关键枢纽，其优势在于既能与国家治理机制有效衔接，又能充分响应基层实际需求，促进国家政策在基层的真正落实，构建城乡一体化治理框架。县域空间优势与治理优势形成了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独特地位：城乡人口流动频繁，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县域汇聚，一二三产在县域延伸融合，城乡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紧密衔接，推动城乡经济循环畅通和治理体系完善^[9]。然而我国县域空间碎片化、经济发展差异化导致县域城乡关系复杂多样，仍需探索不同区域城乡融合的路径。实践中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围绕中心城市形成包含多个县域的片区，内部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突破原有地理单元分割，各片区围绕中心城市进行有序的产业转移，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片区统筹思路下，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空间与治理优势有利于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县域集聚既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又能放大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城乡经济和社会的深度融合。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以县域为载体，通过功能互补与城市群、都市圈对接，融入经济大循环与统一大市场，重塑空间格局、激活要素流动、形成产业协同，破解原有城乡“融而不和”的难题，其创新路径通过经验推广和政策效应积极影响促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

以部分省份的试验区成果为例：马光川等^[3]从空间视角研究发现，山东莱西市在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提升城乡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王成等^[10]认为重庆市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通过特色农业产业创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举措，在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发挥了试验区的示范效应。翟郡等^[11]考察浙江嘉湖片区城乡融合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该片区重点推动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探索出以农业特色产业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强镇为引领，推进多种产业交叉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陈磊等^[12]对成都西部片区考察发现，该片区立足县域单元，以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县域城乡要素功能协同互补与空间结构优化，形成了建构公平、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韩旭东等^[13]提出，江西鹰潭试验区与吉林长吉接合片区的发展，需依托各类试点任务的优先布局，推动资源要素

与支持政策向先行区倾斜，切实提升区域要素集聚、功能服务和产业承载能力。陕西西咸接合片区扩大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平台，激活城乡融合的内生动力，形成“城乡互促、功能互补”的双向流动格局，有效促进了本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张亚丽等^[14]研究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试点政策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理论分析与具体实践表明，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对各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先天基础、后发条件、政策重心等差异，试验区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有所不同。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_1 和 H_2 。

假设 H_1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了该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假设 H_2 ：由于不同试验区发展的初始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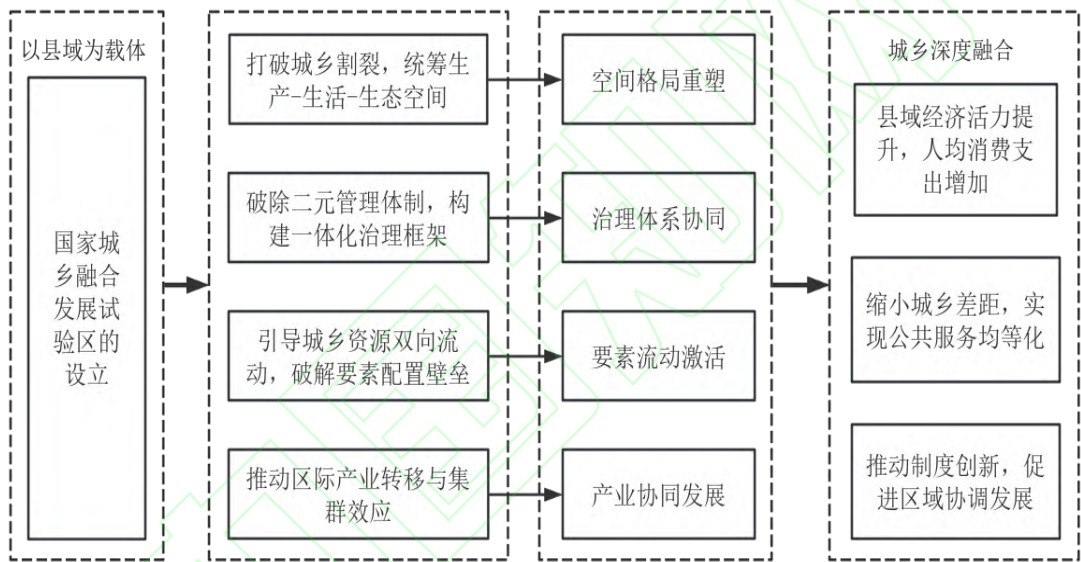


图1 试验区设立驱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图

（二）试验区设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收入分配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巨大^[15]。只有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我国才能在新发展阶段有效实施共同富裕战略。城乡融合打破要素流动壁垒、优化资源配置，既提升全域生产力水平，又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形成包容性增长，与共同富裕具有逻辑统一性。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旨在解决共同富裕中“城兴乡衰”、城乡失衡等结构性困境。试验区制度创新有助于打破城乡多重二元结构，通过因地制宜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产业融合升级、公共服务再分配、制度保障体系完善等举措，系统性修复城乡失衡局面，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

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试验区通过搭建城乡统一的要素流通平台，消除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障碍，推动各类生产要素以县域为中心的双向流动、高效集聚。要素流动打破了城乡产业孤立发展的状态，形成城乡产业优势互补、分工协作、三产融合的全新格局，城乡产业附加值差距缩小。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居民的要素参与度和贡献度提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和财富增值收益，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保障长期收入差距缩小，从根源上破解城乡收入差距难题，为全国范围内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城乡关系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导性变量，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由于我国县域数量庞大，只有让县域经济发展起来才是根本。中共中央提出将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更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城乡融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要素配置、产业互动、公共服务供给等众多领域，其中以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为代表的“共同”因素对“富裕”产生重要作用，“益贫性”经济增长更为关键^[16]。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进一步激活市场需求，稳定投资预期，提升人民群众的公平感与获得感，减少城乡融合的社会摩擦成本，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持续优化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包容性发展，内生性地强化城乡融合，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因此，聚焦县域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步骤。各试验区政策重视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素，强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打通城乡经济循环，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₃。

假设 H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试验区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促进共同富裕。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rural*）。城乡关系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体现在实现人、地、资本的融合^[17]。其中，人的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城乡人口流动与人民生活中。人口城镇化对于有效利用劳动力、维护城乡关系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相比于城市，多数县域是城镇化发展短板，因此要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地的融合是指土地格局、城乡空间的融合情况，土地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农地入市、流转以及退出等机制，实现城乡空间集聚，让土地资源在城乡融合的视角下得到更充分利用。资本的融合是指城乡建设投资的融合情况，可以体现在资源发展与公共服务当中。其中，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能够衡量城乡居民的资源共享程度，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差距，推动构建更加公平的城乡社会关系^[18]。基于上述分析并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建立了如表 1 所示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评

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2.解释变量：各县域是否被设立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pilot*）。《方案》于2019年12月19日发布，在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确定了11个城乡发展综合试点区域，通过对试验区名单进行分析，最终整理得到78个区县的试验区划分情况（其中：长春市长春新区和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市中新食品区、济南市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市西咸新区、咸阳市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广州市花都区以及清远市清城区这8个区域的数据无法获取），并定义为处理组；将试验区所在省份内的其余区县定义为控制组，若该区县为试验区，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为缓解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参照已有研究，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①政府干预程度（*gov*），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比值衡量。②财政收入（*rev*），选取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衡量，并取对数处理。③人力资本（*cap*），使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量与户籍人口数的比值来计算，并取对数处理。④金融发展水平（*fin*），选取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衡量。⑤经济发展水平（*eco*），采用人均GDP取对数来衡量。⑥产业结构（*ind*），选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进行计算。

4.机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c*）。实现共同富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衡量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与必由之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量化原则，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机制变量，通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进行测算，该比值越大代表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也表明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越高。

表1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目标层	准测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方式	属性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人的融合	人口流动	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年末总人口	+
			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建成区面积	-
			非农与农业就业人员比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
			城乡在岗职工人数比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	-
		人民生活	城乡居民存款情况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直接获取	+
			职工平均工资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城乡二元对比系数	（第一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第二三产业产值/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
	地的融合	用地格局	农业用地产值情况	常用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	+
			农业设施占地情况	设施农业的占地面积	+
			土地城镇化率	建成区面积/土地面积	+
		空间集聚	互联网宽带接入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衡量方式	属性
			人均土地密度	建成区面积/年末总人口	+
			城市空间扩张率	农作物播种面积/建成区面积	+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总人口	+
		资源发展	移动电话普及水平	移动电话用户数	+
			农业技术发展水平	单位农用机械总动力	+
	资本的融合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直接获取	+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情况	+
			城乡社会福利单位床位数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
	公共服务		城乡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各地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	+
			在校生拥有专任教师数	普通中小学在校学生数/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	+

（二）数据来源

考虑到从 2013 年开始我国步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故本文选取 2013—2023 年 11 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所在的 78 个区县进行研究;此外,考虑到数据缺失、数据统计错误等问题,为确保后续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本文剔除了部分样本,最终保留 11 个省份内其余的 733 个区县,共计 811 个区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等,其中,部分数据采用取对数的方式处理,并对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i>rural</i>)	0.0313	0.0185	0.0114	0.4713	8921
解释变量	政策效应 (<i>pilot</i>)	0.0437	0.2045	0	1	8921
	政府干预程度 (<i>gov</i>)	0.2149	0.2109	0.0131	3.9407	8921
	财政收入 (<i>rev</i>)	12.8653	0.6075	9.3307	15.2353	8921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i>cap</i>)	6.1216	0.3130	3.7577	7.9171	8921
	金融发展水平 (<i>fin</i>)	0.7699	0.5363	0.0219	7.7031	8921
	经济发展水平 (<i>eco</i>)	10.8402	0.7122	8.6766	15.2910	8921
	产业结构 (<i>ind</i>)	0.4088	0.1003	0.0793	0.8741	8921
机制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i>inc</i>)	0.5641	0.2439	0.2285	3.5832	8921

（三）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法估计各区县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其基本表达式为:

$$rural_{it} = \alpha + \beta \times pilot_{it} + \gamma \times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 \quad (1)$$

(1) 式中, i 表示区县, 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rural_{it}$ 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反映各区县的城乡融合发展情况; 解释变量 $pilot_{it}$ 是反映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 当区县 i 在 t 年设立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时取值为 1, 否则为 0; X_{it} 为控制变量。 μ_i 为区县固定效应, δ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 为误差项。

2. 机制检验模型

本文建立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模型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对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 其中, 中介效应分析采取两步法进行, 相关模型的基本表达式分别为:

$$rural_{it} = \alpha + \beta_b \times pilot_{it} + \gamma \times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phi \quad (2)$$

$$inc_{it} = \alpha + \beta_a \times pilot_{it} + \gamma \times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phi \quad (3)$$

$$rural_{it} = \alpha + \beta_1 \times pilot_{it} + \beta_2 \times inc_{it} + \beta_3 \times pilot_{it} \times inc_{it} + \gamma \times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phi \quad (4)$$

(2) 式 (3) 式为两步法的中介效应模型, (4) 式为调节效应模型, i 表示区县, t 表示年份。城乡收入差距 inc_{it} 为中介变量; 交互项 $pilot_{it} \times inc_{it}$ 为调节变量, 起调节作用; X_{it} 为控制变量; μ_i 为区县固定效应, δ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φ 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 通过 811 个区县 2013—2023 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试验区设立的政策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表 3 的 (1) - (7) 列为依次递增控制变量所产生的回归结果, 对于每一列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显著促进该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 假设 H_1 成立。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pilot</i>	0.0014*** (7.96)	0.0014*** (8.01)	0.0014*** (8.11)	0.0014*** (8.12)	0.0014*** (8.16)	0.0014*** (7.99)	0.0014*** (7.84)
<i>gov</i>		-0.0018*** (-3.06)	-0.0010 (-1.56)	-0.0010 (-1.56)	-0.0008 (-1.12)	-0.0017** (-2.21)	-0.0016** (-2.04)
<i>rev</i>			-0.0006*** (-2.56)	-0.0006*** (-2.58)	-0.0006*** (-2.69)	-0.0004* (-1.81)	-0.0005** (-2.00)
<i>cap</i>				0.0001 (0.65)	0.0001 (0.76)	0.0001 (0.74)	0.0002 (0.91)
<i>fin</i>					-0.0002 (-1.14)	-0.0002 (-1.22)	-0.0001 (-1.08)
<i>eco</i>						-0.0004*** (-2.68)	-0.0004*** (-2.66)

变量	(1)	(2)	(3)	(4)	(5)	(6)	(7)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rural</i>
<i>ind</i>							-0.0012** (-1.98)
<i>cons</i>	0.0276*** (324.02)	0.0280*** (201.40)	0.0352*** (12.48)	0.0345*** (11.52)	0.0348*** (11.58)	0.0372*** (11.87)	0.0379*** (12.02)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369	0.3376	0.3382	0.3382	0.3383	0.3389	0.3392
N	8921	8921	8921	8921	8921	8921	8921

注：***、**、*分别指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二) 识别条件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上述基准结论成立需要一个重要的潜在假设，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回归方程如下：

$$rural_{it} = \beta_s \times D_s + \beta_0 \times D_0 + \beta_k \times D_k + \gamma \times X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 \quad (5)$$

(5) 式中， i 表示区县， t 表示年份。 D_s 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前 s 年的哑变量， $s=2,3,4,5,6$ ； D_0 为试验区设立当年的哑变量； D_k 为试验区设立后 k 年的哑变量， $k=1,2,3,4$ ，具体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从中可以得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前的年份均不显著，而鉴于政策可能存在滞后性，自试验区设立后的第二年开始政策的促进作用逐渐明显。由此表明两组区县在政策实施前的发展状况存在一致的变化趋势，该估计结果验证平行趋势假设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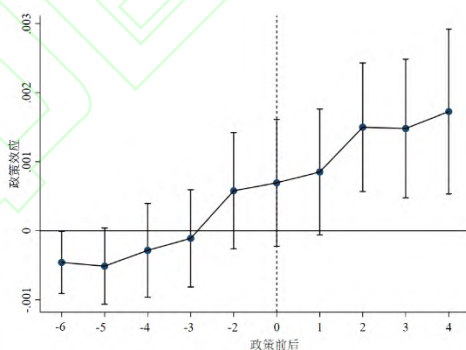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注:垂直于横轴的虚线表示 95%置信区间；0 表示基准期，即 2019 年。

2. 安慰剂检验

在此基础上，采用安慰剂检验排除模型中存在其它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基于随机选择样本，重复进行了 1000 次基准回归，结果如图 3 所示。基

于随机样本估计得到的结果系数分布在 0 附近，而真实的政策效应系数远离绝大部分系数点，双侧检验 p 值为 0.0004，证实了基准回归结论的可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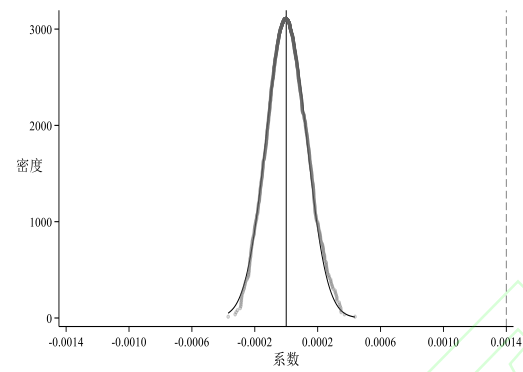


图 3 安慰剂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可靠，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①替换被解释变量。通过两步熵权法对被解释变量进行重新测度，即第一步计算各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中的权重，得到二级指标中不同维度城乡融合发展的得分；第二步计算各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中的权重，得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得分，以代替基准回归中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②PSM-DID。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控制组进行筛选，采取 1：4 的近邻匹配法后再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③政策滞后效应。鉴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效应的显现需要一定周期，存在政策滞后性特征，因此选取政策滞后一期进行分析。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通过表 4 中（1）-（3）列的结果得出，每一列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综上，三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实证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PSM-DID	政策滞后一期
	(1)	(2)	(3)
<i>pilot</i>	0.0032*** (8.80)	0.0008** (2.02)	-
<i>L.pilot</i>	-	-	0.0014*** (7.80)
<i>gov</i>	-0.0029* (-1.85)	-0.0093** (-2.48)	-0.0009 (-1.07)
<i>rev</i>	-0.0006 (-1.30)	-0.0014* (-1.79)	-0.0006** (-2.45)
<i>cap</i>	0.0002 (0.44)	0.0002 (0.28)	-0.0001 (-0.06)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PSM-DID	政策滞后一期
	(1)	(2)	(3)
<i>fin</i>	-0.0004 (-1.24)	-0.0005 (-1.31)	-0.0003** (-1.98)
<i>eco</i>	-0.0008** (-2.43)	-0.0023*** (-3.60)	-0.0004** (-2.09)
<i>ind</i>	-0.0027** (-2.14)	0.0079*** (3.27)	-0.0011* (-1.68)
<i>cons</i>	0.0600*** (9.32)	0.0698*** (5.62)	0.0411*** (12.13)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702	0.3457	0.3022
N	8921	1625	8110

注：***、**、*分别指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四)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探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效应在区域间的异质性，本文对 11 个试验区分别开展双重差分回归分析，以期说明不同省份的发展情况存在异质性，具体结果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由表中数据可得，在东部地区：江苏宁锡常接合片区和广东广清接合片区的政策效应系数不显著；在东北部地区，吉林长吉接合片区的政策效应系数显著；在中部与西部地区，除河南许昌外，其余试验区的政策效应系数均在不同程度显著。这种异质性的产生，本质上是政策冲击与区域发展基础的适配性差异导致的传导效率分化。具体而言，第一，区域初始发展禀赋存在结构性差异。东部地区总体已具备较高的城乡一体化基础，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壁垒等核心矛盾相对缓和，政策实施更多体现为边际优化而非突破性变革，因此政策效应的增量空间有限；而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面临的城乡二元矛盾更突出，农村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政策介入直击发展痛点，形成“补短板”式的显著效应。第二，制度环境与要素配置效率存在差异。东部发达片区的市场化机制相对完善，要素流动的内生动力较强，试验区政策更多是对现有制度的细化补充，政策红利不明显；而中西部及东北部片区在试验区政策推动下，构建要素流通平台、促进产业融合等制度创新有效打破了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第三，区域产业结构与价值链分工存在差异。东部片区现代产业体系相对完善，农村地区可以深度嵌入城市产业链，城乡融合的内生动力较强，外部政策的推动作用相对弱化；而中西部及东北部片区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与现代产业存在明显的价值链断层，试验区政策通过引导城市资本、技术等要素下沉，推动农村产业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政策对城乡融

合的撬动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不同省份地区下所设立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假设 H_2 成立。

表 5 东部和东北部试验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江苏宁锡常 接合片区	浙江嘉湖 片区	福建福州 东部片区	广东广清 接合片区	山东济青 局部片区	吉林长吉 接合片区
	(1)	(2)	(3)	(4)	(5)	(6)
<i>pilot</i>	-0.0008 (-1.23)	0.0008* (1.69)	0.0005* (1.66)	-0.0007 (-1.28)	0.0021*** (4.72)	0.0010* (1.68)
<i>gov</i>	-0.0257*** (-2.83)	-0.0125** (-2.49)	0.0124*** (4.32)	-0.0116*** (-4.40)	0.0139*** (3.44)	0.0060** (1.99)
<i>rev</i>	0.0057*** (5.47)	0.0025*** (2.78)	-0.0019*** (-4.06)	0.0034*** (4.93)	-0.0011 (-1.46)	0.0032*** (2.81)
<i>cap</i>	0.0002 (0.23)	-0.0003 (-0.25)	-0.0003 (-0.58)	-0.0008** (-1.99)	0.0008* (1.71)	0.0002 (0.27)
<i>fin</i>	0.0003 (0.77)	-0.0007** (-2.37)	0.0014*** (3.19)	0.0018*** (3.04)	-0.0003 (-0.54)	-0.0012** (-2.26)
<i>eco</i>	-0.0014 (-1.27)	-0.0022*** (-3.05)	0.0029*** (5.04)	-0.0036*** (-5.13)	0.0008* (1.87)	0.0002 (0.29)
<i>ind</i>	0.0034 (0.65)	0.0040 (1.15)	-0.0066*** (-4.25)	-0.0017 (-1.09)	-0.0105*** (-5.20)	-0.0076*** (-3.69)
<i>cons</i>	-0.0191 (-1.33)	0.0243* (1.86)	0.0153* (1.80)	0.0221** (2.06)	0.0363*** (3.82)	-0.0158 (-1.05)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4849	0.4425	0.7319	0.4322	0.3107	0.5192
N	605	704	759	759	1100	484

注：***、**、*分别指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 6 中部和西部试验区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河南许昌	江西鹰潭	四川成都 西部片区	重庆西部片区	陕西西咸 接合片区
	(1)	(2)	(3)	(4)	(5)
<i>pilot</i>	0.0006 (0.99)	-0.0008* (-1.73)	0.0038*** (10.51)	0.0012* (1.79)	0.0011** (2.17)
<i>gov</i>	-0.0116** (-2.31)	0.0018 (1.03)	-0.0122*** (-6.62)	0.0250*** (4.14)	-0.0056** (-2.18)
<i>rev</i>	0.0009 (0.91)	-0.0002 (-0.46)	0.0029*** (6.79)	-0.0108*** (-6.37)	0.0011 (1.59)

变量	河南许昌	江西鹰潭	四川成都 西部片区	重庆西部片区	陕西西咸 接合片区
	(1)	(2)	(3)	(4)	(5)
<i>cap</i>	0.0023*** (4.81)	-0.0004 (-0.96)	-0.0028*** (-9.59)	0.0026 (1.49)	0.0010** (2.31)
<i>fin</i>	-0.0001 (-0.02)	-0.0014*** (-4.12)	0.0003 (0.85)	0.0020** (2.03)	0.0006 (0.89)
<i>eco</i>	-0.0010 (-1.20)	-0.0008*** (-3.18)	-0.0012** (-2.55)	0.0055*** (3.14)	0.0009*** (3.33)
<i>ind</i>	-0.0030 (-1.51)	-0.0052*** (-3.66)	0.0008 (0.61)	-0.0068* (-1.89)	0.0004 (0.20)
<i>cons</i>	0.0152 (1.51)	0.0360*** (5.04)	0.0253*** (3.69)	0.0916*** (4.54)	-0.0077 (-0.92)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²	0.4340	0.5492	0.5364	0.6589	0.3265
<i>N</i>	1210	836	1276	374	814

注：***、**、*分别指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

(五) 机制检验分析

本文另一核心关注点在于城乡收入差距对试验区政策效果的中介效应。本文分别构建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探究该政策通过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具体结果见表7。表7的(1)-(2)列说明了中介效应的结果，当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时，政策效应系数显著，前文已分析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积极影响，且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由此表明该中介效应显著；(3)-(4)列说明了调节效应的结果，其中，对政策效应(*pilot*)与调节变量(*inc*)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在未加入交互项时以及加入之后，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试验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假设H₃成立。

表7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	
	(1)	(2)	(3)	(4)
	<i>rural</i>	<i>inc</i>	未加入交互项	加入交互项
<i>pilot</i>	0.0014*** (7.84)	-0.0183*** (-2.77)	0.0014*** (7.74)	0.0012*** (6.67)
<i>inc</i>	-	-	-0.0009*** (-3.13)	-0.0011*** (-3.68)
<i>pilot</i> × <i>inc</i>	-	-	-	0.0035***

变量	中介效应		调节效应	
	(1)	(2)	(3)	(4)
	<i>rural</i>	<i>inc</i>	未加入交互项	加入交互项
				(5.17)
<i>gov</i>	-0.0016** (-2.04)	-0.2384*** (-8.23)	-0.0018** (-2.32)	-0.0017** (-2.21)
<i>rev</i>	-0.0005** (-2.00)	-0.0366*** (-4.00)	-0.0005** (-2.14)	-0.0006** (-2.42)
<i>cap</i>	0.0002 (0.91)	0.0035 (0.51)	0.0002 (0.93)	0.0002 (1.15)
<i>fin</i>	-0.0001 (-1.08)	-0.0231*** (-4.42)	-0.0002 (-1.23)	-0.0002 (-1.37)
<i>eco</i>	-0.0004*** (-2.66)	-0.0099 (-1.63)	-0.0004*** (-2.71)	-0.0004*** (-2.60)
<i>ind</i>	-0.0012** (-1.98)	0.4486*** (19.54)	-0.0008 (-1.27)	-0.0007 (-1.18)
<i>cons</i>	0.0379*** (12.02)	0.9195*** (7.75)	0.0388*** (12.25)	0.0392*** (12.41)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392	0.3255	0.3400	0.3422
N	8921	8921	8921	8921

注：***、**、*分别指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五、结论与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选取 2013—2023 年相关省份的 811 个区县作为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该政策的实施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显著，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验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并且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滞后一阶政策后依旧成立，即试验区的设立能够促进该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第二，不同试验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对于东部地区，江苏无锡常接合片区和广东广清接合片区的政策效应不显著；对于东北部地区，吉林长吉接合片区的政策效应显著；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除河南许昌外，其余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均在不同程度显著。上述成因可能与试验区内部的初始资源禀赋、要素配置效率及区域产业结构差距有关，因而发展进程存在差异。第三，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试验区的设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城乡融合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一定的调节

作用，对试验区内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向调节影响。

（二）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县域要素配置机制，加快试验区成果转化。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枢纽，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应以县域为着力点，全力打破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与信息等要素在县域范围内实现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在劳动力要素上，全面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消除户籍壁垒，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择业；建立人才入乡激励制度，通过提供创业扶持等政策，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优化乡村人才结构。在资本要素上，以县域为单位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加大金融机构对试验区农村产业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业务，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在技术与信息要素领域，搭建城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向县域转移，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农村产业发展；加强县域信息化建设，完善县域信息服务网络，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全方位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

第二，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实施差异化城乡融合策略。不同地区结合相近试验区的建设目标，明确区域发展定位，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性政策实施路径，突出试验区经验推广的精准性与差异性。针对东部高禀赋区域，政策重点应从“补短板”转向“提质量”，聚焦城乡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打破隐性流动壁垒，深化产业链协同、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配套，进一步释放内生融合动力。对于中西部及东北部要素禀赋相对较弱的区域，应加大财政倾斜与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健全要素市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通过引进城市资本、技术与人才，培育乡村特色产业集群，破解资源约束瓶颈，放大政策“补短板”效应。同时，建立试验区动态评估与分类指导机制，细化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定期跟踪不同禀赋区域的政策实施成效，针对性调整政策侧重点与资源投入方向，确保政策精准适配区域发展需求。

第三，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在城市周边及农村地区，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与城市产业形成互补格局；加强对城乡产业融合的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建设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创新平台，推动新技术、新工艺在城乡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此外，积极发展“数字+”现代农业，以增加农产品创收为着力点，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农业+电商直播”等，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与效率，让农民更多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同时，强化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注入持续动力，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高度，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物质保障。

第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激发共同富裕发展动能。城乡收入差距偏大是当前城乡融而不合的突出表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促进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路径，应将其置于政策工具箱的基础地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协同发力的政策体系。初次分配中，重点以要素赋能和产业增值夯实增收基础，深化农村土地和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益；引

导城市资本、技术与农村资源深度结合，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带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延伸使农村居民分享产业链利润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再分配层面，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精准扶持，建立与城乡收入差距挂钩的转移支付动态调整机制，积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投向农村基础教育、技能培训等领域，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与要素贡献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消除就业歧视与流动壁垒，以城乡融合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激发共同富裕发展动能。

注释：

-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5》。
- ②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5/05/content_5388880.htm
- ③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s://paper.people.com.cn/rmlt/pc/content/202410/08/content_30029983.html
- ④资料来源：发改规划〔2019〕1947 号。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912/t20191227_1216773.html

参考文献：

- [1] 魏后凯，刘金凤，年猛.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障碍、目标与长效机制[J]. 财贸经济，2025（1）：18-29
- [2] 赵伟佚，潘玮，李裕瑞.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内涵与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2023（6）：1445-1464.
- [3] 马光川，林聚任. 空间视域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莱西市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42-49.
- [4] 朱玉春，胡乃元，马鹏超等. 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2024（2）：98-108.
- [5] 姚毓春，夏宇. 中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高质量发展效应分析[J]. 求是学刊，2025（1）：58-77.
- [6] 张明皓，叶敬忠. 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2022（11）：1-10.
- [7] 贺立龙，刘丸源. 共同富裕与现代化视域下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3）：89-105.
- [8] 段锴丰，王宁，郑旭辉等. 城乡融合何以纠正资源错配？——来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证据[J]. 财经研究，2025（8）：21-35.
- [9] 涂圣伟.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基本导向与推进路径[J]. 江苏社会科学，2024（8）：35-45.

- [10] 王成,代蕊莲,陈静.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2(3):645-661.
- [11] 翟郡,邱玲玲,王静等.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的时空演变、发展趋势及障碍因素识别[J].经济地理,2025(8):122-131.
- [12] 陈磊,姜海.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基本认知、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5,(10):86-97.
- [13] 韩旭东,杨慧莲,郑风田,等.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理论机理、实践现状与优化方向[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17[2026-01-11].
- [14] 张亚丽,陈杨洋,项本武.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5,35(06):201-212.
- [15]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J].管理世界,2022(1):52-61.
- [16] RAVALLION M.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Looking beyond Averages[J].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11):1803—1815.
- [17] 刘明辉,卢飞.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9(2):33-46.
- [18] 闫言,刘泽言.乡村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实现机制与实证检验[J].税务与经济,2025(1):68-78.

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Na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FU Qiong¹, ZHANG Shizheng², LI Xinguang²

(1. School of Finance,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130117, China;

2. Jili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and coordinating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o reshape the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explore the path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state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form in December 2019.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setting up 11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cross the country, this study selects 811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relevant provinces from 2013 to 2023, and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analyze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pilot zone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effect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 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pilot zone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itial resource endowments,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within the pilot zones. In addi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ilot zones can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mprove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policy on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optimize the county-level factor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ilot zone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resource endowments,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rategies; promote urban-rural industrial synergy to consolidat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common prosperity;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o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for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a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common prosper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